

◀ (上接6版)

题很绞些脑髓，却是我本来的工作并没有停。每礼拜四堂讲义都讲得极得意，每次总讲两点钟以上，又要看学生们成绩……”

家事、同事，也是拖累梁启超身心健康的原因之一。

1924年9月13日，原配夫人李蕙仙病逝，梁启超悲痛万分。1926年9月26日，最小的儿子思同出生（王桂荃所生），第二年3月因肺炎夭折，给梁启超打击很大。

1927年6月，清华研究院同事，同为导师的王国维因厌恶时局，含恨自尽，梁启超说：“竟为恶社会所杀……研究院学生皆痛哭失声，我之受刺激更不待言。”为这伤心事，梁启超“一个多月来旧病发得颇厉害，约摸四十余天没有停止”。他本想在暑期做些政论文章，却遭到好友“蹇季常、丁在君、林宰平大大反对”。

可是在给孩子们信中，没有流露出丝毫地心情不爽：“你们别要以为我心境不好，我现在讲学正讲得起劲哩，每星期有五天讲演，其余办的事，也兴会淋漓。”梁启超有自己的信念，自己的事业：“我总是抱着‘有一天做一天’的主义，（不是‘得过且过’），却是‘得做且做’）所以一样的活泼、愉快。”

三

仅1926至1928年三年间，梁启超在学术方面的主要著述有：1926年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》《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》《先秦学术年表》

《荀子评诸子语汇释》《韩非子显学篇释义》等；1927年《中国文化史》《儒家哲学》《书法指导》《古书真伪及其年代》等；1928年《辛稼轩先生年谱》等。

梁启超生命中的最后数月，“专以词曲自谦”，忙于撰写《辛稼轩先生年谱》，在北京协和医院住院期间，托人寻觅辛稼轩材料，“忽得《信州府志》等书数类，狂喜，携书出院”。回到天津，“未及数日，即发微热，延日医田邨氏诊治，未见有效……衰弱日甚，渐至舌强神昏，几至不起”。1928年11月27日再入北京协和医院医治，病情不见好转，又发现新病，加以身体虚弱太甚，遂卒不支，于1929年1月19日在医院逝世。

梁启超留下许多未尽手稿，一部分是在患病期间起草的。梁思成说父亲“于人生观无论环境如何，辄以不忧不惧为宗旨，虽至临终之前数日，犹日夜谋病起之后所以继续述作之计划”。《饮冰室合集·专集》目录中，列有《残稿存目》，达二三十篇之多，有目无文。笔者在整理编纂《梁启超全集》的过程中，努力追踪梁启超的残稿及佚诗佚文，终于看到部分残稿的“真相”。

《梁启超年谱长编》称：1904年“冬，著《中国之武士道》《中国国债史》两书成。所著《中国民族外竞史》改名《国史稿》，即前名之《中国通史》已成二十余万言”。在《中国之武士道·自序》中说：“顷编国史至春秋战国间，接先民警款，深为所感。动为史裁所限，不能悉著录也。乃别著《中国之武士道》一编，为学校教科发扬武德之助焉。”

梁启超自1901年起“有志于史学”，作《中国史叙论》一文，次年作《新史学》一篇，“这两篇文章便是先生著《中国通史》的准备和指导思想。他在《新史学》里面的主张，多采西学新说，加以先生的识见超卓，所以这篇文章对于整理中国旧史的工作，有很大的贡献和帮助”。至1904年，《国史稿》成二十余万言。这是梁启超早先计划编著的《中国通史》，曾改名为《中国民族外竞史》现又改为《国史稿》，并准备付印。在给蒋观云的信中说：“拙作今题曰《国史稿》，已成二十余万言，日间亦将印第一编，待丛稿就理，更当亲赍记室，乞先生一叙，乃付梓人也。”尽管这样说了，但未见《国史稿》公开发表。在残稿中，发现的情况是这样：《国史稿》，是“残稿”中的“长篇”，用“饮冰室著述稿本”稿纸书写，共四十四叶，每叶正反面，每面十三行。首叶署“新会梁启超述”。

笔者所见《国史稿》共四十四叶，列出：

第一编：上古史。

第一卷：华族东来时代（自开辟迄洪水）：

第一章：传疑时代（神农以前）：第一节：悬谈；第二节：神话；第三节：东来最初之伟人。

第二章：初有史时代（自黄帝迄尧舜）：第一节：炎黄之际中国形势；第二节：黄帝；（第三节原稿缺）第四节：尧舜。

第三章：华族东来时代形势总论：第一节：华苗竞争大事表；第二节：地理开化之次第。

第一编后是第三编（缺第二编），与《残稿存目》同。

第三编题为：发展时代。

第一章：春秋概观，与《残稿存目》所示“第三编：春秋时代至齐之霸业”不同；第二章：国土沿革；第三章：霸国政治；第四章：周室略纪；第五章：外族略纪；第六章：楚之勃兴；第七章：齐之勃兴；第八章：齐之霸业。全稿至此结束，全稿约三万余字。

此外，《残稿存目》所示《霸国政治》和《春秋时代我族与戎狄交涉表》均找到，前者共六叶，后者共四叶，都用“饮冰室著述稿本”稿纸，据《残稿存目》称：“亦《国史稿》之又一稿。”《国史稿》第三章“霸国政治”，残稿中又发现一份“霸国政治”，两者内容不同，究竟有无关联，有待进一步研究。

1927年3月10日《致孩子们书》：“思永说我的《中国史》，诚然是我对于国人该下一笔大帐，我若不把他做成，真是对国民不住，对自己不住。也许最近期间内，因为我在北京不能安居，逼着埋头三两年，专做这种事业，亦未可知。我是无可无不可，随便环境怎么样，都有我的事情做，都可以助长我的兴会和努力的。”1927年3月21日《致孩子们书》：“再看一两星期怎么样，若风声加紧，我便先回天津；若天津秩序不乱，我也许可以安居，便屏弃百事，专用一两年工夫，做那《中国史》，若并此不能，那时再想办法。总是随遇而安，不必事前干着急。”梁启超与梁思永谈论的《中国史》，可能就是残稿中的《国史稿》，或是其增补，有待进一步研究。

《残稿存目》中有两篇年谱初稿，一是诸葛亮，一是曾国藩，特别引人关注。两者皆用“饮冰室著述稿本”纸，与《国史稿》稿纸同。《诸葛亮年谱》共四叶，正反面，每面十三行。年谱起于“汉灵帝光和四年”（181），止于“后主建兴十二年”（234）。《曾文正公年谱》，共三叶，起于“嘉庆十五年”（1810），止于“咸丰三年，公四十三岁”（1853），距离曾国藩卒年尚有二十年，是真“残稿”。

四

梁启超身患重疾，仍然乐观向上，是坚强的信念、对国家和子女的爱支撑着他，他告诉孩子们：“你们几时看见过爹爹有一天以上的发愁，或一天以上的生气？我关于德性涵养的工夫，自中年来很经些锻

炼，现在越发成熟，近于纯任自然了。我有极通达、极健强、极伟大的人生观，无论处何种境遇，常常是乐观的，何况家庭环境，件件都令我十二分愉快。”

在1927年8月29日信中，梁启超叮嘱女儿思庄在国外学成后早日归国，“可以做爹爹一个大帮手，我将来许多著作，还要请你做顾问哩”。此时思庄正在攻读生物学，一年预科读完，升二年级，梁启超非常高兴，因为此前“你们弟兄姊妹，到今还没有一个学自然科学，很是我们家里的憾事”，“中国女子还没有人学这门……因为这门学问与一切人文科学有密切关系”。梁启超多么期盼几年后女儿学成归国，与女儿共同探讨、研究学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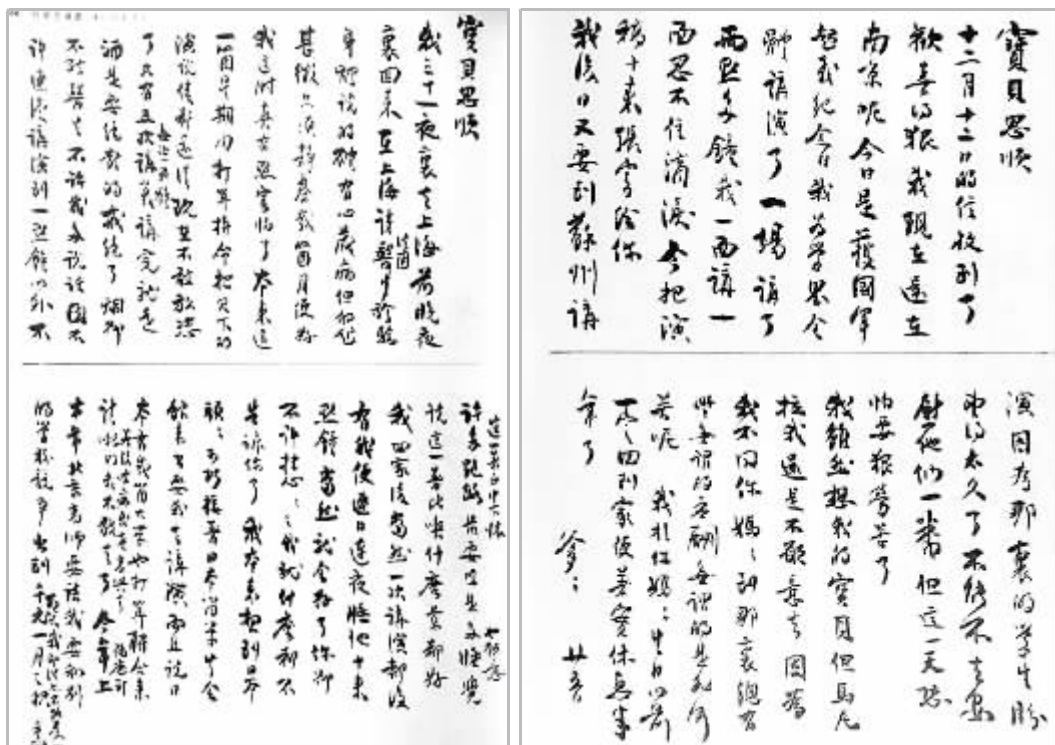
1929年1月29日，梁启超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，享年57岁。梁启超在世的最后三年中，重病缠身，又备受工作、党派纠缠，但他仍以著书立说、授课演说的一贯做法救中国。三年间著述何止一二部，只是拥有的时间太短，不免留下了太多的遗憾。

王国维在颐和园投湖自尽，年仅51岁，梁启超曾悲叹道：“若再延寿十年，为中国学界发明，当不可限量。”“若再延寿十年”的话语，同样适用于梁启超。丁文江说：“梁先生生平以著作报国，实有四十年之历史”，“先生四十年之中，脑中固绝未忘一‘国’字。”他“文名满天下”，留下一千数百万字的论著，涉及政治、经济、哲学、文学、历史、法律、宗教、新闻、教育、音韵等学科，甚至各类自然科学，他的论述适应社会和读者的需要，影响是巨大的。

因此，梁启超的家书——《致孩子们书》，不是一般的家书，而是充满爱国爱家情感的家书。在“家书”中可以看到他对祖国的爱，也可以看到他对孩子们的爱。只有祖国强大，孩子们才能更加茁壮地成长，他的“著书立说”，正是为了救中国。

本文引文所涉文献包括：《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》（下）、《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（初稿）》（丁文江编，世界书局1959年4月版）、《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》上册（中华书局编辑部、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编，中华书局2012年10月版）、《梁启超年谱长编》（丁文江、赵丰田编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）

（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）



梁启超家书手迹